

# 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讲述六十多年治学感悟—— 向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求索智慧

张卓元

有趣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让我入了迷。当时我正在读高三,高考时我报了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广东商学院的经济系,而后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系同时录取,我放弃了清华大学,选择了后者。

的,既不保守,也不过激。由我主编、价格室同事共同撰写的《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理论与实践》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荣获中国价格学会主办的1998年首届“薛暮桥价格研究奖”著作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也佐证了这一点。

源的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针对这种情况,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两年后的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这生动证明了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推动着价格形成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 名家小传



张卓元,我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1933年7月生,广东梅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13次参加中央文件起草,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主张,是“稳健派”经济学家代表之一、推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领军人物,参与我国经济改革顶层设计20多年。主要业务专长为政治经济学、价格学。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薛暮桥价格研究奖,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所所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1995—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理事长、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价格学会副会长等。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和利润》(1983年)、《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1987年)、《张卓元文集》(1987年)、《论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化改革》(1995年)、《张卓元文集》(2005年)、《张卓元经济论文选》(2010年)、《新中国经济学史纲》(2012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四十年》(2018年)。



扫一扫  
看视频

## 思想人生

开栏的话:思想引领人生,人生点燃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许许多多的优秀理论工作者和各领域专家学者,或因先进思想引领走上研究探索之路,或因自身实践产生的思想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本报今起开设《思想人生》专栏,邀请全国知名理论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如何受他人的思想引领开启非凡人生,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影响社会,以冀对读者有所启迪。

## 一

我1954年秋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头几年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洋教条的影响,研究工作没有什么进展。1957年底孙冶方到经济所担任所长后,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对现行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和方法要敢于提出标新立异的观点。他到任后抓的第一件事,是向中央打报告要求经济所实行双重领导,即既由中国科学院领导,又由国家计委领导,由国家计委出题目让研究人员做实际课题研究。从此,经济所开启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在这一背景下,我在1961年和1962年两次到浙江省调查,头一次是跟随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到杭嘉湖地区调查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农产品成本问题;第二次是跟随原国家物价局副局长张翼飞到杭州调查农产品成本和价格问题。这两次调查,使我对中国农村实际有了初步的了解。调查回来后,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关于农产品成本调查和计算的若干大问题的探讨》,发表在《经济研究》1961年第8期;另一篇叫《关于农产品成本计算方法的几个问题》,发表在1962年6月11日的《光明日报》。显然,没有这两次浙江调查,这两篇文章是写不出来的。还有,1961年秋,我还跟随经济所节日安副所长到上海调查企业经济核算问题,回来后在《经济研究》1961年第11期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大学毕业不久,三十岁之前,大体上就不再只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抠概念、搞规律排队等,而是转从实际出发,找问题,找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提对策建议。这主要是因为受孙冶方理论的影响,并且自此以后,我一直在继承和发扬孙冶方的精神、思想和理论,这是我经济学研究的“领路人”。而激发我学习经济学浓厚

## 二

改革开放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更加明显、突出。1983年,我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直到1993年的十年间,我的研究重点是我较为熟悉的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我价格研究室的同事一起,到北京市和外地调研,参加国家物价局和中国价格学会(现中国价格协会)组织的有关如何推进价格改革的研讨活动。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当时无论是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从实际出发,提出自认为是最优的改革方案,希望得到党和政府的采纳。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价格学会很活跃,在会长(先后是国家物价局副局长刘卓甫和成致平)的组织领导下,几乎每年都举行一次年会,物价部门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上百人参加,主要讨论价格改革如何推进的问题。由于大家都在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探索,常发生不同意见争论,真正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我和财贸所价格室同事都是参会的积极分子,常提供论文和作大会发言。财贸所价格室主任王振之是学会秘书长,之前供职于全国物价委员会,财贸所价格室有几位研究人员也是从物价部门调来的,这使我们同物价部门有较密切的联系,便于了解许多实际情况,使我们写的论著和改革与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现实针对性,受到有关方面重视,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当时我们提出的意见和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价格改革的重要性,从理论上阐述价格改革是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二,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主张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要通过改革行政定价管理体制为市场定价体制,促进价格关系的合理化;第三,价格改革要逐步推进,不能一步到位,先是调整价格,一旦有机会就放开价格,然后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第四,在价格改革过程中,仍需坚持稳定物价或基本稳定物价的方针,为此必须反对通货膨胀,在出现中位及以上通货膨胀时,要先治理通货膨胀,为价格改革逐步创造条件;第五,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必然现象,双轨价差过大主要是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造成的,一旦双轨价差缩小至一倍以内,就要不失时机地变双轨制为市场单轨制。

中国经济改革和价格改革的实践证明,以上这些主张和政策建议是站得住

## 三

从1993年—2013年,即我60岁到80岁,我有幸参加了十多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每次都在半年以上,最长的一次是参加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起草,前后历时一年多。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对于像我这样的理论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接触实际、了解中国国情,了解党中央如何作出战略决策、确定发展改革大局的学习机会。我的许多研究成果和论著都是在这20年间产生的。

2001年秋,我上玉泉山参加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两个毫不动摇”,也是经过认真总结浙江省等一些地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宝贵经验而作出的。《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指出,“这几年像浙江、江苏、广东等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很快,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并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2005年春天起,我参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一进玉泉山上我居住的房间,办公桌上已摆好十多本十六开本的资料。记得当时最吸引我注意的是国家发改委关于经济情况的介绍,其中特别提到,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经济连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高消耗还带来高排放高污染。正是根据上述令人不安的情况,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了要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但是,此后十年,这一任务未能很好落实,原因主要在于政府改革、财税改革、价格改革等不到位。从价格改革来看,则主要是许多重要资源如水、能源、矿石等价格均由政府控制,长期偏低,还有是高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不收费不治理。从新世纪开始,中国价格改革的重点已转向资源和资源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改变长期价格偏低的扭曲状态。而在价格形成的理论方面,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价格是在市场交换中形成的,但价格形成没有很好考虑资

# 为“两个先行”贡献高能级产业平台力量

王 涯

实验室、浙江博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延伸发展智能传感产业创新链。

下一阶段,建议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快建设产业创新中心、工程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企业研究院、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双创”示范基地等多层次平台,着力打造创新策源地,形成更具活力和爆发力的高能级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着力引进和培育一批有实力、有潜力的产业龙头、行业冠军、独角兽企业,积极招引全球领军型企业在新兴产业平台设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鼓励新兴产业平台企业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业创新合作,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科研成果加快转移转化。

## 人才赋能,集聚产业发展高端要素

“万亩千亿”各平台紧扣“产业链”打造“人才链”“创新链”,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大力引进集聚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有效集聚产业发展高端要素。例如,衢州高端电子材料产业平台设立浙江大学衢州“两院”实验实训基地,围绕新材料专业定向培养人才,首批26个教师团队及26名硕士研究生已经顺利进驻,20多个科研和技术攻关项目启动实施。湖州吴兴智能物流装备平台围绕智能物流装备等主导产业发展需求,用好“鲲鹏计划”等重大工程,深化实施技能人才培养工程,“大学生招引直通车”工程,加大“高精尖缺”人才、

高技能人才及大学生人才引进力度。

下一阶段,建议建立健全柔性引才机制,最大限度激发“人才效应”,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完善项目引才、以才引才等方式,增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行业企业的有机联系,深化协同育人,定向培养等人才合作培养机制,集聚和培育高端人才。积极推进人才飞地建设,共享飞地政策、资源红利。同时,搭建集聚多方面具体应用场景、打通业务部门系统的人才一体化平台,力争实现人才精准洞察、人才孵化精准对接、人才需求精准触达和人才服务一键办理。

## 集聚发力,搭建高能级未来产业架构

“万亩千亿”新兴产业平台建设模式多样化,其中,引进龙头企业、集聚产业集群是首要路径,推动关联产业项目集中布局、集群发展,加快形成高能级未来产业架构。例如,绍兴集成电路产业平台依托一批国内外半导体领先企业,形成产业链。宁波杭州湾新区智能汽车产业平台集聚上汽大众、吉利汽车两大龙头企业,吸引延锋、江森、中信戴卡等上下游15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入驻。

下一阶段,建议积极把握新一轮产业发展变革趋势,明确聚焦数字经济核心领域、智能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端生物医药、前沿材料等五大重量级未来产业,涵盖集成电路、智能汽车、人工智能等40余个细分领域的产业,持续培育发展,在现有产业集聚基础上实现再腾飞。围绕重量级未来产业定位,做好产业链招商选资服务,建立项目及企业招

引筛选机制,对具有行业影响力、重大牵引力的项目主动出击,千方百计引进战略投资,从源头聚集高端产业。同时,积极探索跨区域跨部门产业共创新模式,完善新兴产业平台“链长制”,有效促进产业链双向延伸,推动优质高效的配套保障,全面助力产业跨越式发展。

## 项目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能级

聚焦现有产业链的薄弱和空白环节强链、补链、延链,以重大项目支撑“顶配版”产业平台建设水平提升。例如,总投资479亿元的衢州高端电子材料平台浙江时代锂电国际产业合作园建设项目、总投资260亿元的北仑集成电路平台芯片半导体项目、总投资50亿元的滨海新区生物医药平台科技智谷国际营养健康产业园项目等,均成为提升平台产业水平的亮点,“万亩千亿”新兴产业平台已成为全省高能级未来产业标志性项目承载地。

下一阶段,建议抓好平台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平台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加快公共配套设施及商业设施建设,提升平台软硬件环境质量。立足产城融合新空间的发展定位,积极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配套。加大对平台的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供给及新型基础设施配套支持,着力破解资源要素对平台发展的制约。  
【作者分别为浙大城市学院教授、省重点智库中国政府采购与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省重点智库中国政府采购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经济》总编辑】

## 专家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当前,无论是乡村产业发展的“规模小、布局散、链条短”“水平低”“同质化”,还是农村社会处于深刻变化和调整时期的“散”,都亟需构建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农村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构成,切实把农村融入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以农村消费为重点的内需提振背景下,其重要性尤为突出。我省作为东部沿海开放省份,长期走在改革前列,有责任、有基础、有能力先行探索。

## 融入统一大市场对农村发展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加快推进农村融入统一大市场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有助于打通制约农村发展与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以更大市场活力凝聚更大发展合力,对我省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省、乡村振兴示范省具有重要意义。

兑现要素价值,释放农村发展潜力。融入统一大市场,以标准化、一体化的市场手段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要素,可以在加大财政投入和引进社会资本中实现“资源变现”,进而拓展农村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持续释放农村发展潜能与乡村振兴活力。

提升商品价值,赋能农业提档升级。融入统一大市场,使农业发展突破物理、经济与制度壁垒,实现深加工、仓储、物流等的高度标准化与集约化,最大限度提升农业商品价值,优化商品市场配置,助力实现农业整体提档升级。

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融入统一大市场,使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得以全面对接和精准衔接,农村居民依托统一大市场分享发展红利、享受无差别产品服务,提高生活品质。

## 浙江具备的基础和优势

我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优势明显,特别是近年来以乡村振兴示范省建设、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契机,率先探索城乡一体化建设,已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深度挖掘农村资源与生态优势潜力,先行探索要素大市场建设。农村最大的优势在于资源与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于资源与生态。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活化农村资源要素取得明显成效。比如,德清县作为国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深挖土地要素潜力,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234宗1928.56亩、成交金额5.37亿元、增加村集体收益4.33亿元。

着力推进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高效畅通商品大市场建设。近年来我省以农业大数据建设为核心,持续推动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融合,统筹抓好农产品生产供应、产供销衔接、流通运输与质量安全等,确保“产得出、供得上、不脱销”。比如,武义县搭建“浙样销”数字化平台,整合供应链、采购端、平台商三大信息,通过精准匹配和双向推送达成信息撮合,试运行4个月,实现20多种果蔬和优特农产品产销信息撮合600多笔。

## 高标准推进农村融入统一大市场的四个要点

着眼长远和全局,切实推进农村融入统一大市场,要立足城乡统筹发展的大场景、激发数字化改革的大动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的大提升,发挥有为政府的有效作用。

立足城乡统筹发展是重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第一,建立公平竞争的城市统一市场。完善产权保护、放开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农村市场主体拥有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第二,推动城乡一体的交易平台建设。打破受行政区划掣肘的市场分割状态,建立权威统一的市场交易平台,便捷获取供需信息,从根本上扭转农村市场主体在信息不对称中的弱势地位。第三,提升城乡一体的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深化推进城乡资源要素同权同价,以市场化估值让农民获得公平回报,不断拓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大幅度提高财产净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

激发数字化改革活力是重要特色。以数智赋能实现涉农数据的高效归集与有效利用,为农村融入统一大市场提供强有力支撑。第一,依托统一市场实现动态生产。建立省市联动数字农业平台,通过对种植业、养殖业各生产经营主体的数据采集、归集,实时监测农情、及时分析市场信息,实现农业生产在省域范围内的动态调整与优化调节。第二,优化大市场产业链供应链效率。深化“浙农码”等大数据集成应用,夯实数字化基础设施与公共资源平台建设,实现生产、收购、物流、仓储、销售的全流程数字化运营,在有效降低成本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效率。第三,保障大市场体系平稳运转。充分利用大平台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与精准研判,确保“产销购储”体系良性循环,确保农产品价格长期平稳运行。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重要关切。中小企业是推进农村融入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要采取针对性措施给予支持。一方面,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重点是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提升服务水平,给中小企业提供稳定的政策保障和便捷的政务服务。另一方面,探索推进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代表的农村中小经营主体抱团发展,以联村组建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社为主要方式,拓展推进合作社(联合社)+公司+农场等不同组合方式,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农村产业集群。

建设有为政府是重要保障。推进农村融入统一大市场,破解各类分割难题,亟需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有效作用。第一,做好政策引导,科学实施宏观调控。以科学审慎的政府监管化解市场风险,切实增强政府部门在一体化市场中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经济安全的能力。第二,深化职能转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农村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改革,实现政务服务城乡同标办理,提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第三,夯实制度规则,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以保障市场竞争的开放有序和活力高效为目标,坚持制度和标准先行,在加强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中,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参与,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要素流动自主有序。

【作者分别为浙大城市学院教授、省重点智库中国政府采购与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省重点智库中国政府采购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 新书推荐

近日,《中国与西方:当前经济、政策与应对》一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该书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研究院教授林毅夫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扬·什维纳尔一起邀约全球十几位学者共同写作,从当前政策、贸易、局势和分工、创新、数字化以及领导力等多个方面,共论全球经济与政策,以提供应对与思辨,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

国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什么?人口是制约创新的重要因素吗?怎么正确理解贸易全球化?而对金融危机,不同国家的政策有何差异?世界秩序不断变化,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数字经济对当前的全球经济政策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本书不仅希望提供各位作者的权威分析和观点,而且希望激发关于中国和西方共同未来的进一步思考和辩论。在如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世界上,这种思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 之江青年论坛

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是“两个先行”的基础之举,需要着眼长远谋划布局更多重大产业项目,构建高水平的创新空间格局和产业平台体系,加速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增长带。作为浙江产业向高端迈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全省四批“万亩千亿”新兴产业平台聚焦浙江基础坚实、未来前景广阔、符合前沿潮流的新产业,积极集聚高水平创新资源、引进高端人才和项目,有效提升了浙江高端产业发展规模及水平,拓展了新的产业发展空间,为“两个先行”贡献了高能级产业平台力量。

## 创新引领,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创新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万亩千亿”新兴产业平台的建设遵循。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就是创新。创新成为“万亩千亿”各平台建设的重中之重,成为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活力之源。例如,杭州钱塘新区高端生物医药产业平台依托中国药科大学(杭州)创新药物研究院、浙江大学生物医药产业平台依托中国药科大学(杭州)创新药物研究院、药明生物杭州基地等平台,打造“政府、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四位一体的协同创新链,提高企业自主研发、同步研发能力。嘉兴中新嘉善智能传感产业平台依托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国家重点实验室离子束联合